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影响与政策取向

杨孟禹

摘要: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与相关问题, 尽管可以从诸多学科视角对其内涵、建设路径、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阐释, 但空间经济学却是比较适用的分析视角。中国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重“破”轻“立”、局部市场建设探索、基础设施“软”“硬”不协调的政策实践, 以及规模经济、市场一体化效应等空间经济理论逻辑。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成的简单空间体系看, 持续完善更有效引导产业向西转移的政策体系, 不但有利于让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得去”, 还能让其“去对地方”; 在欠发达地区培育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相关多样化集聚体, 既能发挥欠发达地区的特色产业优势, 也能更快培育出具有一定特色产业基础的主导产业; 欠发达地区崛起不应只着眼于规模经济, 而应更关注如何增加劳动力逆向流动概率; 与此同时,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也对其他的国家重要战略政策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关键词: 全国统一大市场; 新发展格局; 政策取向; 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99.2、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22) 05—0141—10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中国在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战略举措。面对着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挑战, 筑基新发展格局, 就必须扭转过去形成的各种地方保护、条块分割、孤立小市场的现象, 建设高质量的全国统一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实际上, 自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开始, 中国就一直致力于建设高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体制机制探索, 分别历经了围绕国企改革、产权改革和开放改革为核心的发展历程^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破除了诸多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桎梏和非制度障碍, 助推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强势崛起。然而, 当制度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削弱, “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的长期制度建设亟需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动力, 统一大市场是一系列制度改革的集合,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为此,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市群的溢出效应时空演变与战略深化研究”(项目号: 18CJY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孟禹, 男,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政府非税收收入研究所所长,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

^① 金碚: 《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兼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意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进了深水区、关键区,标志着中国将高质量市场建设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8—2021年,中国省级市场化指数方差分别为5.823、5.794、5.769、5.739^①,呈逐年下降态势,表明各省内部的市场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通过比较2021年的东西、南北部的市场化指数发现,东部相当于西部的1.7倍,北部地区相当于南部地区的1.2倍。通过比较市场分割指数^②可以发现,2019年是2014年的14倍之多^③,而且西部地区2019年市场分割指数方差是东部地区的4倍左右,北部地区是南部地区的1.2倍,西部地区内部市场分割比东部地区更甚,北部相对南部亦如此。不难得出结论,过去几十年中国省际间很可能陷入了市场分割加速经济增长的囚徒困境。^④此外,从供给角度看,市场分割还可能通过抑制规模效应、阻碍技术创新发展、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使落后产业挤占新技术产业资源,降低地区产业生产率和污染处理水平,增加污染排放量。从需求端角度,一方面市场分割导致需求不足,企业预期收益低,缺乏开发、使用新技术的动力,企业生产率低和污染处理能力弱;另一方面政府为追求政绩盲目投资短期回报产业,污染排放量增大。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下滑、老龄化社会近在眼前的背景下,打破市场分割,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之路。

事实上,国内大市场的建设与理念构想由来已久。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这是党第一次在文献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方向,即开放合作统一的市场才能促进要素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强调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都强调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动构建高效规范的国内统一市场。此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相关工作会议也研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难题。鉴往知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系统总结过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经验教训后,又一理论突破,改变了过去重点强调的“破”,“立”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回应,学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对于市场分割的形成,现有文献多数从文化多样性^⑤、土地制度^⑥、财政制度^⑦、官员晋升激励^⑧、政府治理^⑨等因素方面给出解释;而在实践层面国内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路径如何选择则更受关注,当前学者分别从财政制度优化^⑩、加快城乡融合^⑪、优化区域和城乡分工^⑫、调整区域政策^⑬等路径给出了政策建议;最后是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逻辑方面,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⑭和政治经济学^⑮方面给出了解释。作为对既有文献的补充,本文从空间经济学视角重点讨论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逻辑、

① 数据来自王小鲁、胡李鹏、樊纲等人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市场化指数是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程度,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指数组成。

② 毛其淋、盛斌:《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③ 2019年为最新的可比较数据。

④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⑤ 徐现祥:《汉语方言、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

⑥ 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

⑦ 吕冰洋:《财政激励制与晋升锦标赛:增长动力的制度之辩》,《财贸经济》2022年第6期。

⑧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⑨ 刘志彪:《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⑩ 参见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⑪ 刘守英:《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经济动态》2022年第3期。

⑫ 张可云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⑬ 刘志彪:《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⑭ 张磊、黄世玉:《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⑮ 金碚:《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兼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空间逻辑、空间影响以及未来的政策取向。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实践中，首先在总体上进行了一系列旨在“破”笼的国企、产权和开放政策改革，而对应的“立”却显著滞后；其次中国实践上也在城乡间、城市群内部、省域等典型区域进行了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尝试，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软”“硬”不协调的矛盾，这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空间上最基本的实践逻辑。

（一）过去市场建设着重在“破”，“立”不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探索，可以追溯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①这种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奠定了日后进行一系列市场机制改革的政治基础。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当年经济情况和来年改革举措后进一步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改革步子要迈大一些。”^②进一步拉开了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序幕。此后虽然着眼于“破”笼的国企和产权等一系列改革得以推进，但与发展背景相契合的新规则、新秩序却并未被“立”起。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梯度推进对外开放，客观上推动了地区市场分割。首先，较早开放的沿海地区由于最先接触国际市场，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发育较好，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较晚开放的内陆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发展较慢，整个地区的竞争力较弱。地方利益驱使落后地区不甘于在地区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为谋求本地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实行地方保护政策。其次，增量改革战略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开放政策，使各地方政府拥有了不同程度的政策性垄断权力。此外，国企改革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政府一方面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经由国企继续保持通过一定行政干预调控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2年）、企业制度创新阶段（1993—2003年）、继续完善和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纵深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三个阶段，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提升。但迄今为止，政府干预企业、政企合谋等现象，在诸多地区已成为制约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剧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

由于各要素市场参与规则相对商品市场更不统一，所以要素市场分割程度高于商品市场，这集中体现在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的市场配置，主要表现包括：（1）城市土地分配权、农村土地的征用权与使用者的选择权都归地方政府，制度刚性与市场功能的欠缺极大限制了土地要素市场配置效率。（2）尽管现行户籍制度改革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目标，但现实中常住人口真正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仍然与户籍直接挂钩，对劳动力要素的进入和退出形成天然排斥，统一的户籍制度尚未形成。（3）经多次“破计划经济的笼”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迎来了黄金十年，并最终演变为资本“抢菜篮子”的局面。（4）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够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决策，是中国形成“行政区经济”的主要原因。特别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保证在经济增速总体下滑形势中完成施政业绩指标，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更加倚重短视性的产业政策。这使得一些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的项目在各地不断涌现，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行为：一是以出台文件的形式变相要求本地消费者消费本地产品，同时动用价格杠杆，削弱外地产品在本地市场的竞争力；二是以维护本地企业利益的名义，限制甚至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各项招投标活动，同时借助国有企业行使行政垄断权力设置和提高行业门槛，并最终将全国大市场逐渐分割为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小市场。^③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

^③ 刘志彪：《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二）局部市场建设的实践逻辑

典型的局部市场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提出了“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与之衔接，国务院于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城市支持农村”等内容，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具体规划。为发挥城镇化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先后出台《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等文件。而党的十九大对城乡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国务院于201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城乡一体化的根本目的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为了“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国家发改委还颁布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和《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随后又于2020、2021、2022年提出《2020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城乡一体化建设显然已迈入体制机制建设的深水区。

自“十三五”以来，中国共布局了19个城市群，其中优化提升类5个、发展壮大类5个、培育发展类9个，城市群局部一体化进程有序推进。其中，“优化提升”和“发展壮大”的10个城市群发展相对成熟，内部一体化程度高。这些城市群拥有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坚实的产业基础以及优良的对外开放条件。梳理相关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不难发现，这些城市群主要通过聚焦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来促进一体化发展。此外，培育发展类的9个城市群，虽然基本处于东北或中西部地区，而且正处于发展初期，还面临一体化程度低、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较高、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不足等问题，但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的城市规划已相继出台或实施。

（三）传统市场建设“硬”“软”不协调的实践逻辑

“十三五”期间中国交通运输总投资达15万亿，其中公路投资7.8万亿，占比过半，其中主要投向高等级公路。2012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达9.62万公里，2013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0.4万公里，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①截至2021年底，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更是超过了16.8万公里，约为2012年中国公路里程的1.75倍，虽然大幅纠正了资本、劳动、中间投入品的要素扭曲度^②，但更长期持续的矫正机制并未真正建立。高铁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名片之一，2012年底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仅为9356公里，而截至2021年底，中国高铁通车里程总计40517公里^③，增加了4.3倍。此外高铁还连通了中国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显著降低了空间经济的营商成本。从营商环境^④看，2021年的各省宏观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485，是2012年的1.86倍，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与综合实力的提升；但从反映政府干预市场程度、税收负担的政策环境指数看，相较2012年各省政策环境指数平均值0.142，2021年为0.144，不降反升。这些现象表明，尽管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空间效率有所提高，经济体量也在逐步扩大，但省内政企关系、政府市场关系却在悄然复杂化，其本质是市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不协调。

三、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空间逻辑与空间影响

明确统一大市场的空间内涵与背后的空间逻辑是分析其空间影响的起点，本节在分析“统一市场”和“大市场”的空间逻辑基础上，分析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产生的空间影响。

① 数据来源：交通部《2012和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步晓宁等：《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

③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网站。

④ 李志军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及有关建议》，《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一）“统一市场”的空间逻辑

“统一”意为“部分联成整体”^①，即将各自分割的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市场，显然“统一”并非“同质”，而是整合，是异中求同。实际上对于市场空间的认识和剖析一直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空间应是“同质”的，“同质”的市场即无任何摩擦的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在该市场空间中，不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很多学者将视野转移到如何真正反映现实市场空间的研究中，DS垄断竞争模型^②的出现为解释诸多新市场空间现象提供了新视野。该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进行同质化单一化的产品生产，而是尽可能地生产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簇，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空间，在不同空间生产的产品也必然带有其空间特征，比如同样是橙子，赣南脐橙和褚橙在产品特点上完全不同，任何产品都脱离不了其原产地自然气候、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特征，同样的产品由于产地不同，产品性质和特征也可能并不相同。

故而，“统一”市场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各地要发挥各自生产产品和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哪怕同一产品亦可以实现因地域不同而实现多样化生产的意蕴。从供给方面来说，这实际给予各相似产品充分的竞争空间，能够实现相似产品在国内大市场中的优胜劣汰。从需求方面来说，多样化的产品生产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眼花缭乱的相似商品选择，对消费者来说是提升了福利。^③此外，“统一”还包含着要建立打破行政边界、江山河海阻隔的市场机制的需求，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县与县、县与地级城市、县—地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之间早已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路线等“硬件”联系在一起，但相应的“软件”，如产品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等并未统一，这无形间阻碍了产品品质的提升和相互间更充分的流通和竞争，最重要的是各地营商环境差距也非常大，政府服务市场主体的能力不同，也会形成阻碍。总而言之，“统一”不等于“同质”，同质的完全竞争市场只存在于想象中，完全异质的市场则因为可能“无竞争”而没有效率，故而构建同质化和差异化并存的多样化市场，才是“统一市场”的根本内涵所在。

（二）“大市场”的空间逻辑

“大市场”不仅强调“规模”上的量，更强调“结构”上的质。在新经济地理学看来，“大市场”不仅要求较高的市场需求潜力，还要求企业生产中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然而，市场需求规模背后需要收入结构优化的支撑，供给产品结构多样化的支撑，否则无异于无本之木。首先，市场需求潜力的提升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1）绝对可支配收入，其高低直接影响消费者消费倾向，社会消费倾向高，内需潜力就大；（2）相对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构，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呈现明显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由于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而低收入群体可支配绝对收入低，所以高低收入群体对内需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中等收入群体对内需的拉动效应就极为关键；（3）更多样化的商品，由于消费者消费偏好是想用有限收入获得更多样的产品购买能力，因此越能满足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市场，潜力也越大，而在普遍的空间中某一点能够生产的商品种类总是有限的，为提高内需就需要从区外进口，进口产品的贸易成本越低，显然越有利于构建本地多样化的产品市场。

其次，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市场需求越大，企业产量越多，由于存在学习曲线效应^④，企业平均成本反而越低的现象。原因在于：（1）“大商品市场”直接增加了企业产量，有利于降低企业平均成本，最终提升了盈利能力，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较低的平均成本意味着较低的价格，提高了其实际工资水平。（2）“大

① 参见《现代汉语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② A.Dixit, J.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Vol.67, No.3.

③ P.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Vol.99, No.3.

④ 企业累积产量越高，由于工人的经验更丰富，生产成本越低的现象。

要素市场”加剧了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优化企业产品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投入结构,提高效率。(3)

“大市场”可激发空间结构经济,有利于优化和加强东西部、南北部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优化城市群内城市规模体系、城乡关系和企业规模结构等。总而言之,“大市场”不是“有规模没质量”或者“有质量没规模”,而是质量和规模在某种程度上的权衡,真正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不但需要供给端多样化产品结构支撑,更需要中等收入人群收入结构优化提升。“大市场”的内涵绝不仅仅是规模经济的量的表现,而更强调社会收入结构、空间结构、产品供给结构优化。收入结构决定需求潜力,空间结构提高要素和产品配置效率,产品供给结构则取决于消费者多样性偏好。

(三)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空间影响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提出分析统一大市场如何筑基新发展格局的分析框架。由上可知,统一大市场建设至少产生一个结果,即贸易成本降低或市场开放度提高,这不仅包括运输成本,也包括其他一切与区域贸易有关的成本,如谈判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的降低,还包括一切影响区际贸易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壁垒或阻碍的削弱。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关于市场开放度变化对核心区(发达地区)—外围区(一个或多个欠发达地区)构成的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区域市场开放度变化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1)对发达地区而言,其之所以繁荣是由于本地市场规模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产生的集聚比市场拥挤效应引起的扩散力强,前者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企业偏爱大规模本地市场,故而其源源不断地将具有强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吸引至集聚区,后者则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和分类选择效应,源源不断地将高技能和高效率劳动力吸引至集聚区。大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和高效率或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集聚,是发达地区繁荣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当然,由于企业和劳动力的大规模集聚,必然会受到空间土地成本、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等因素的反向影响,一般称之为拥挤效应。如该效应小于集聚效应,则发达地区正处于集聚阶段,反之则处于扩散阶段。(2)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高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以及高人力资本和高效率的劳动力的集聚体未建立,在发达地区较高的集聚比作用下,要素被虹吸,导致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

市场开放度提高对发达地区的影响。从长期看,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处于东部为核心区、中西部为外围区的“核心—外围”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根据上述理论,一方面,其他因素不变时发达地区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很可能打破集聚力和扩散力相对均衡的局面,因为原来发达地区的诸多企业可能由于受到转出成本的影响而未发生转移,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刚好降低了这部分成本,所以发达地区市场开放度提高很可能促进发达地区的企业向外围区转移,这实际上也开启了发达地区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发达地区由于较高的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那些对此承受能力较低的企业可能首先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对要素和环境成本不敏感的高科技产业则继续留在发达地区,从而实现了发达地区产业的优胜劣汰和升级,提高了集聚效率。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市场开放度提高,不但降低了劳动力流入成本,而且由于发达地区更高的集聚效率也提高了劳动力工资,最终结果是发达地区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增强了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集聚规模;同理,市场开放度提高的发达地区对资本要素亦具有强集聚比。当然,这种集聚并非只是“量”上的集聚,更表现在“质”上,因为发达地区在具有高工资和高回报率的同时,也伴随着高房价,而且由于留下来的企业更多的是盈利能力强、回报率高的科技型企业,所以最终在发达地区长期就业的是高技术、高工资的工人,其所需的薪酬也相对较高。可见,市场开放度提高不但明显加速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这种“筛选效应”^①,而且也加速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因此,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提高发达地区的要素“筛选效应”,促进“绿色转型”。

市场开放度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市场开放度提高可能导致要素加速流出;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发达地区转出的企业和技术进入,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因此,欠发达地区到底何去何从取决于两种力量的权衡效应,而影响权衡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正是欠发达地区需求端的市

^① J.Eeckhout, R.Pinheiro, K.Schmidheiny, "Spatial Sor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Vol.122, No.3.

场潜力和供给端的比较优势。前人研究表明,发达地区转出的企业和技术进入欠发达地区需要欠发达地区具备一定的市场潜力,当欠发达地区市场潜力低于门槛值时,从发达地区转出的企业不会进入该区,那么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该区会出现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当市场潜力大于门槛值时,欠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比较好的产品市场需求基础,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些欠发达地区更容易承接从发达地区转出的企业和技术,这种产业承接实际上是完成了产业的空间分工优化;此外是当欠发达地区的供给端比较优势较强时,由于更低的要素成本或者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从发达地区转出的企业来说,由于供给端的成本骤降,很可能降低其对欠发达地区市场潜力门槛,所以欠发达地区供给端比较优势越强,企业和技术进入欠发达地区市场潜力门槛就越低,就越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转移,“借用”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最终实现发展。^①因此,欠发达地区市场开放度提高是否能够促进其发展,主要取决于欠发达地区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市场潜力和比较优势的强弱,二者越强,欠发达地区越可能在统一大市场中实现发展。

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对“双循环”的影响。正如前文分析,从出口角度看,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有利于促进空间产业分工优化调整,可以发挥国内区域产品生产比较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尽可能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企业出口产品价格,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此外,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大城市、大企业的要素“筛选效应”,提升城市或企业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产业链、价值链攀升;当然,这亦能影响国内中间产品的出口,由于国内市场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所以有利于扩大中间产品国内需求,降低对国外中间产品供给,最终替代出口。从进口角度看,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通过促进国内区域产业空间分工优化,专业化的生产越来越突出,市场上拥有更多多样性的产品供给,从而改变原来对进口产品的需求结构,对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愈加明显。因而,国内市场开放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对国外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依赖,增强进口替代效应。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角度看,如果将国际经济竞争合作看作是空间经济发展竞争的话,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增强中国作为独立的经济集聚体在国际竞争中对要素的集聚力,并降低分散力。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外流、人才外流、高精尖产业科技创新不足的原因,本质上与国内经济集聚体竞争力不强、集聚效应不高有着很大的联系。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真正具备引领作用的大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充分形成市场规模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吸引资本和劳动力向中国集聚,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正向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才是在极端情况下稳住国内经济基本盘,并增强正常情况下的经济外部抗风险能力、经济全球竞争力、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的根本之路。

四、统一大市场建设下的空间政策取向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空间影响要如何通过政府政策干预扬长避短?本节主要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产业转出端和转入端视野来进行空间政策取向分析。

(一) 持续完善更有效引导产业向西转移的政策体系

从空间角度看,统一大市场建设本质上就是“让空间更少摩擦,让空间更有效率”。从东部地区(核心区)—中西部地区(外围区)构成的空间看,统一大市场必然加速二者在能源、产业、原材料之间分工合作适配,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东部地区的产业必有转出,而政府要做的是解决欲转出产业的“出得去、去哪里”的问题。所谓“出得去”,就是要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那些由于显性或隐性因素产生的各种产业转出成本,尽可能减少转出“摩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效应;所谓“去哪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确保东部地区转出产业“去对地方”,过去几年中国东部地区诸多转出的产业已经转移到南亚东南亚国家,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需引导转出更多产业自愿地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确保东部地区转出的产业能够“落得了地”,广袤的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面积要大得多,资源、能源、人力资

^① R. Baldwin, F. Robert, *Economic Geography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and CEPR, 2006.

本、创新能力等相似的地区很多（如云南、贵州、广西以及重庆等），究竟如何选择？截至目前，在部分欠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国内仅建立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内蒙古赤峰（待批）、皖江城市带、湘南、湖北荆州、江西赣南、重庆沿江、广西桂东 8 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示范区在推进中还存在覆盖省份不足，以及定位的承接产业转移类型不够精准、相互竞争、特色不显等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如何降低东部地区产业的转出摩擦，如何持续完善中西部地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及如何用好诸多省份已有的开发区、园区、自贸区的相关政策，让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不但“出得去”，还能“去对地方”是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必须把握的政策方向。

（二）在欠发达地区培育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相关多样化集聚体

除了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根据前文分析欠发达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的培育至少有市场潜力和比较优势两个思路。当市场潜力比较弱时，欠发达地区是难以承接欲转入的产业的，此时欠发达地区必然在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中每况愈下，这当然不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合意结果。因此，政府干预是必然的，市场潜力的培育有两个思路：一是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二是增加当地人口集聚规模。实际上，如果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能力、收入水平或人口集聚规模能够持续自发地增长，那么从长期看，市场潜力达到阈值是必然的，也就是说长期而言发达地区产业一定会转入，那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因此，市场潜力培育的思路一定程度上是市场无法维持持续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人口集聚规模的提高时，政府应该进行“输血式”干预。故而，长期可持续的产业承接能力培育还得寄希望于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培育，同样有两个思路：一是区位好、资源要素禀赋强，这种比较优势是外生的，短期不会改变，政府需要选择与之适配的产业进行培育；二是在没有较好区位、资源要素禀赋时，地方政府能够把握国家宏观政策趋势、国际国内市场需求趋势、技术趋势，率先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从第一种思路看，欠发达地区实际上发展的是特色产业，其产业链短、带动效应差，短期内难以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欲实现这种产业转型只能通过承接外来产业带动；而第二种思路则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产业转入地承接能力培育，不能只着眼于政府“输血”式的市场潜力培育，更要着眼于建立起基于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相关多样化的产业承接环境培育。所谓相关多样化路径，即欠发达地区要立足于资源要素禀赋首先发展特色产业，但仅仅是特色产业还不足以成为主导产业，还要依托于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延伸，并结合国内外产业技术演进规律，培育与之相关的系列小规模的未来产业，待机而发。

（三）欠发达地区崛起不在于“规模经济”而在于如何增加劳动力“逆向流动”概率

传统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和企业集聚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其潜在假定是要素是同质的，要素之间不存在异质性，所以该理论在解释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发展时，也将其归结为欠发达地区生产要素和企业的集聚不足而规模不经济。这实际上会引发某种程度上的空间悖论，如果空间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且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不强的话，那么实际上发达地区已经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增长，欠发达地区是很难通过相似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实现经济赶超的，原因在于空间中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发达地区集中得多，那么不发达地区必不会有相似的规模经济。当前，在分析如何促进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诸多分析文献中，均不约而同地强调规模集聚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思路。

从现实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包含的要素均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这尤其体现在劳动力的技能高低和人力资本积累差异上。笔者认为，异质性劳动力的选择效应才是解释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异质性及其引发的空间选择效应，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能够承受更高的集聚成本，从而其更偏向选择集聚规模较大的发达地区，低技能、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则更多只能选择集聚规模较小的区域。因此，空间选择理论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存在的发展差距归因为异质性的劳动力异质性的空间选择的结果，而与集聚规模无直接关联。这显然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即如何增加欠发达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逆向流动”概率。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就是降低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和流动空间摩擦，在其建设成效较高的情况下，二者也降到了最低。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欠发达地区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逆向流动”的因素是什么？首先，较高的货币收入以及稳定的就业预期是必要的，这当然需要高盈利率的产业支撑，如高科技产业、科研机构、公司总部等，除此之外更大的推力来自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各种因素，如清新的空气、轻松的生活、多样的生态环境等，前者是欠发达地区难以企及的，后者则在欠发达地区基本不稀缺，且随着经济整体实力提升和劳动力红利的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开始关注健康养生，关注如何提高生活生命质量，这为欠发达地区制定增长战略提供了市场机遇。因此，想方设法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逆向流动”概率的发展思路相对于传统规模经济发展思路可能更适合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现实。

（四）对其他重要战略有更高的协同性要求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空间视角上看主要在于能够减少空间贸易摩擦、降低贸易成本，这会对全国经济空间格局产生较强的重塑效应，那么如何扩大重塑格局的正效应并抑制负效应、实现“1+1>2”，就成了重要战略政策目标之一。下面按照空间尺度从大到小的次序分别展开讨论为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当前国家主要战略政策有更高的协同要求。

第一，从东部和中西部构成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可能加速东部资本西移，也可能加速西部资本东移，这主要取决于东部地区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大小。第一种情况，若东部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意味着东部资本集聚的收益是较高的，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势必会加剧这一趋势，后果就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为对冲这种趋势，就对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建设的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生态文明战略等提出了更高的协同性要求。中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就近疏解资本集聚的理想之地，同时也是联通东西部的空间桥梁；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落后，但是能源和生态服务的重要供给地，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生态文明战略等战略政策的交织区、重叠区。这些战略政策只有发挥协同合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对冲东部地区资本高效率集聚而引发的新一轮地区差距扩大。第二种情况，东部地区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小，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定会加速资本西移，由于东部资本具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支撑，中西部各省市由于地方政府保护而发展起来的低效率企业将面临新一轮“大浪淘沙”。短期上看，这一定会对中西部地级和县级城市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要求，中西部既要做好防冲击准备，又要“打扫干净屋子请客”，如对于特大和超大城市要“疏解非核心功能……推动组团式发展”，而对于县城则“支持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发展”。对大城市采取精明发展思路，有利于提高效率，从容面对全国市场的竞争；对小城市则采取“打扫屋子请客”的思路，提高承接能力，吸引资本进入。这种大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思路，总体上有利于引导西移资本匹配到“对”的地方。

第二，从城乡二元结构的空间格局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实际上等同于城乡一体化加深。而广大乡村地区，无论从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国土空间功能区划、守住耕地红线等战略政策角度考虑，都不适宜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绝大多数农村剩余人口是需要进行“市民化转移”的，这点从《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的第一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得以体现，但乡村地区也决不能成为个荒无人烟的“空壳子”，所以这里就涉及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行动的协同问题。过去，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兜底”式的脱贫致富，而当前乡村振兴行动则强调如何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者的结合点在于，乡村地区由于不能搞大规模产业发展和占地建设，必然承载力不足而产生剩余劳动力；中国多数县城则刚好相反，过去普遍土地扩张大于人口扩张速度的后果就是，人口集聚规模相对土地规模显著不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然可以加速这种供需匹配进程，这从《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两个重点就可见一斑。未来乡村通过生态服务价值实现增长、县城则

通过工业和服务业集聚增长，必然形成彼此依赖、相得益彰的城乡空间格局。

综上所述，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于容易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两极化空间格局，所以就难以完全避免引起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扩大的可能。而当前从空间经济学角度下看共同富裕战略政策目标主要针对的就是上述“三个差距”，越能扎实推进，就越能对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负效应，这种远见体现在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当前所有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战略政策都必须协同地归一到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这一点上来。笔者认为，政府的战略和政策目标总能直击市场运行的痛点和盲点，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体现。

The Logic, Influence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conomics

YANG Meng-yu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path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ny disciplines. However, the influence and the related issues of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ve always been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space. The current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started from the policy practice logic and the spatial economic logic: the former emphasized “breaking” rather than “establishing”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exploration of domestic local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the incongruity of “soft”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the latter focused 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effect. From the simpl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system that more effectively guide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west part of China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mak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developed regions “accessible”, but also make it “go to the right place”. Cultivating relevant diversified clusters between specialty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can not only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specialty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but also cultivate leading industries with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foundation faster. The rise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economies of scale,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probability of labor return. Meanwhile,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coordination requirements for other important national strategic policies.

Keywords: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olicy Orientation, Spati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张莺译]